

陶希圣离开上海后的逃亡经历

1940年,日本欲以诱降手段结束侵略战事,与汪精卫签署“汪日密约”。高宗武和陶希圣曾追随汪精卫鼓吹“和平”运动,并参与筹组汪伪政权及与日本的“和平”谈判。在此过程中,高、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汪精卫所谓的“和平”运动是彻底的投降与卖国。1940年1月3日,高、陶二人逃离上海抵达香港,在《大公报》揭露汪日密约及其附件。《潮流与点滴:陶希圣回忆录》一书是陶希圣对一生重要经历的回忆,其中即有他和家人潜逃香港,后几经辗转重返重庆的逃亡经历。

逃离上海

1939年12月29日,在沦陷后的上海公共租界愚园路,日汪之间,所谓“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”谈判完毕,定于31日签字。我是(笔者陶希圣)参加谈判之一人,一眼见那日本军阀分割中国的野心企图,白纸写上黑字,要借中国人之手去签字。这件事是断不可为的。当晚,我回到法租界环龙路私宅,即称病不出,与妻子冰如计议如何脱险走港。

1940年元旦,为避免汪精卫、周佛海诸人怀疑,我抱病到汪家拜年。拜年之后,汪精卫妻子陈璧君主张我现场补签密约。汪精卫说道:“他面色不好,改日再补签。”这是一个生死开头。倘使我被邀补签而不肯下笔,那就是我的生命断送的时候。

这天自汪家回法租界私宅,仍然卧病在床。高宗武来拜年并问病。我对他说:“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,你怎样?”宗武说:“走了吧!”于是我们决定

乘4日开船往港的胡佛总统号。

4日上午,我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。下车之后进入大厦,从后门叫车到黄浦码头,直上轮船。船航行到公海后,我才从船中打电报给冰如报平安。至5日清晨,冰如才把我写好留在家中的几封信,叫人送到汪家。

汪精卫诸人得知我离沪往港,大为惊骇。我的住宅门口,一时之间,有亲友来问讯,亦有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。厨子被调走了,工役不能出门。家中没有饭菜吃,只是将日前剩下的饭菜烧热吃。冰如带着女儿和小孩子躲到法国公园里,她自己整天不吃亦不喝,在那里枯坐流泪。大孩子们仍然各自上学。

这种情势何能持久?冰如决计到汪家去看陈璧君。6日一早,冰如见到了陈璧君,她说:“希圣在外边做什么,我不知道。他跟随汪先生15年,为什么要走,事前也没有商量。香港为是非之地。他这一去,难免不说话。等到他一篇文字发表了,那就迟了。我相信他不会轻易发表什么。我决定自己到香港去,连劝带拉,要他回上海。”

留下孩子

陈璧君不肯答应冰如的要求,推辞说:“这要看汪先生的意思。”冰如再三说:“我这回去,只带两个小的孩子,三个大孩子仍在这里上学。”说到这里,陈璧君才有允意,她去请汪到客厅来。汪精卫起先还是未曾松口。恰好这时,有人送一封信进来,汪看信之后,面色大变。原来这是我从香港寄给汪的。信的意思是请他们保障我的家属

的安全。如果他们陷害我家属,我只有走极端。至此,汪、陈才答应派冰如到香港去。“只要希圣回上海,什么条件都可以做到。”

冰如得到允许之后,立即购买船票,乘法国邮船离沪往港。她带了四儿晋生及五儿范生上船,留下女儿琴薰,大儿泰来,三儿恒生在上海。当冰如从十六铺码头上船时,三个大孩子在码头上,眼见他们的母亲带着弟弟上船,船上与船下都痛哭失声。这一去是生离还是死别,是无从预知的。

冰如到港后,我们住在九龙尖沙嘴亚叙里道。她先打电报给陈璧君,说“希圣即可偕返上海”。汪、陈接到电报之后,随即离上海到青岛去了。

后来在杜月笙的帮助下,三个大孩子也逃出虎口,于1月20日到了香港,我们才在21日把日汪密约发表出来。

生离死别

1941年年底,日军进入香港,随后下令疏散难民。友人帮我搞到了一张惠阳的难民证,我只能独自先行返回内地。

离开的那天,我在晨5点左右,从楼上一步一步下楼梯走到门口。冰如跟随着一步一步送到门口。我和冰如这一生离,也许是死别。我们约好,倘如她带着孩子们能够进入内地,同时我亦能脱险,我们将在桂林相见。我二人各自两眼含泪。我就是那样,踏上大道,跟随着难民们出发了。

当时所有的车辆都被日军集中了。一些难民最多只能将溜冰鞋两双当做车轮,上面加一木板,作为搬运行李之用。我们一行连这种临时车子也都没有。我们步行到大浦上了渔船。黄昏时,船开了。

日军的政治部获得情报,陶希圣一行36人走了。我们出发的第二天,有一群36人从九龙走到深圳。那是戏剧家俞大纲一行。他们在深圳被日本宪兵截留。其中有一位会说日语,便与宪兵交涉。宪兵将他悬在梁上,五个人换班拿着皮鞭打,要他供出陶希圣。这位先生将两手一抱前胸,挨了几小时的打,没有招供。那宪兵队便把他们

一行释放了。

我们一行向惠阳进行时,突然得到消息,惠阳也被日军占领。我们在路上逗留和迂回了好几天,才又上船,循东江到龙口。我从龙口乘省政府的小汽车到韶关,已经是阴历的除夕。郑彦棻是省政府秘书长,他接我到主席公馆吃年夜饭。

家人团聚

我到韶关后立即打电报给桂林《扫荡报》。报纸发表我到韶关的消息,就是冰如和孩子们第二次脱险,走到桂林的那一天。

他们是从九龙搭白银丸到广州湾,再从广州湾由杜月笙派来的范先生领路,到桂林。

白银丸是海南人包下来的船,得到日军的许可,由九龙运送难民到广州湾。冰如携泰来、福来、恒生、晋生、范生与龙生排队上船。他们在码头上,遭逢日本宪兵鞭打,受到太阳的晒,上船之后,两天两夜,没有吃喝,也不能移动,不敢说话。

船到了广州湾,法国捕房不许旅客上岸,迫令他们原船回港,随船的日本宪兵不许回港。难民们一片哭声和抗议,同时推代表与宪兵交涉。到了黄昏时候法国巡捕收班,那全体旅客才下划子上岸。

冰如带着孩子住在一家旅店,并打电报到重庆给杜月笙。第二天范先生接到杜月笙电报,寻到旅舍,送来川资,并筹划由广州湾到桂林的方法。

他们一行离开广州湾,中途遇见盗匪。范先生带了当地的几位保安队员,与他们作了交代,总算是未曾被劫。

我从韶关经衡阳,乘火车到桂林,一家人总算是重新团聚了。

可是没过多久,我就从桂林随同一位将军乘飞机到了重庆。

我的家属在桂林住了七个月后,他们从桂林搭长途汽车,到金城江,那里客栈不知道有多少旅客等候车子。他们找到白先生,也是杜月笙的指示,才得到车位到重庆来。我们在南岸一家印刷厂借住,那是我家第三次团聚。

据《潮流与点滴:陶希圣回忆录》陶希圣/著

罗家伦对体育教授处以“严刑”

1928年8月,罗家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。当时,也许是思想和认识上的不足,罗家伦根本看不上体育,他认为,体育部的教授不成体统,“纯粹带领学生瞎胡闹,浪费了学生大好的学习时间”。为了以儆效尤,罗家伦拿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马约翰教授“开刀”,对其降职降薪,改为一名普通教员。

当马约翰教授降职的消息刚一公布,立即在校园内引起轩然大波,许多人为其鸣不平。因为在平日的教学中,马约翰一直兢兢业业、尽心尽力,深受学生们的喜欢。现在,罗家伦校长竟然对马约翰教授处以“严刑”,就连学生们都为马教授的遭遇感到心痛。

当时,有人好心地劝马约翰道:“以你的才能,完全可以去别的大学任教,不愁找不到更好的工作。”不过,马约翰却大度地表示,自己热爱中国,并以清华为家。现在,他只管

尽力做好手上的工作,将学生们的体质提高上去才是最主要的事情,至于其他的,自己一切遵从学校的规章制度。

时间不长,马约翰教授带领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参加华北地区足球赛,一举拿了冠军,轰动一时。那天,当马约翰和足球队的队员们回到清华大学时,学生们燃放爆竹,热烈欢迎马约翰和他的足球队凯旋。当时,情绪高涨的学生们还把马约翰教授从西校门一直抬进了校园,场面非常壮观。

当清华足球队夺冠的消息传到罗家伦校长的耳朵时,想到自己之前对马约翰的处罚决定,他深感愧疚。第二天,罗家伦不仅当面向马约翰道歉,而且又重新任命马约翰做了教授。除此之外,罗家伦还送给马约翰一个银杯作为奖励。罗家伦校长这种有过即改的坦诚,也受到了全体师生的赞赏。

据《现代家庭报》姚秦川/文